

# 中国诗词大会为何这么火?

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二季自播出以来好评如潮,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,被誉为电视界的一股清流,成为年初电视节目中一匹最大的“黑马”。日前,节目总决赛落下帷幕,00后复旦女孩武亦姝不负众望夺得了冠军。综艺和鲜肉霸屏的今天,一档诗词类文化节目为何如此火爆?

为此,不少专家从各个角度点评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口碑与收视齐飞的原因。“中国人诗心不死”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专家嘉宾、原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蒙曼认为,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诗词基因还在,一旦有一种形式把它展示出来,就会形成一种喷发。

## 中国诗词大会打到了鼓点上

蒙曼说:“从《诗经》开始,人们非常习惯诗词这种审美方式,愿意用这个来表达感情,虽然这样的文学形式逐渐被放弃了,但是基因还在。《中国诗词大会》打到了鼓点上,一下激发了中国人的诗词基因。”

随着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的火爆,00后选手武亦姝也得到了网友大量的关注。在蒙曼看来,武亦姝的走红和诗词大会成功的道理相近,因为他们都激发了中国人内心的一种情感共鸣,而并不是因为她夺得了最后的冠军。因为早在节目刚刚播出时,武亦姝凭借强劲的实力和淡定的心态,就在“飞花令”环节一战成名。



武亦姝在比赛中

当时的主题字是“月”,武亦姝微笑着将《诗经·邶风·七月》的名句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。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脱口而出,令大量网友折服其气度和才情,也让不少人高呼,这才是00后的正确打开方式。

蒙曼认为,激发人们心中埋藏最深的情感,往往会得到奇迹般的喷发,诗词如

此,人亦如此。蒙曼坦言:“我们心目中对一个女孩不就是这样期盼的吗?希望她很文静,有高雅的品位,学问好,人不做作,落落大方,人淡如菊,中国人对于年轻女性的审美品位,武亦姝都囊括了。”

## 文化的痛点常成传播的热点

关于诗或词,中国人

有着独特的文化情结。一部中国历史始终伴随着中国的诗歌史。盛世必言诗,“大江东去”形成唐宋诗词创作的顶峰,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体现着当今中国人的豪情;节日必言诗,所谓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;人世必言诗,“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”;出世必言诗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;触景时言诗,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;生情时言诗,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;闲适时言诗,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……在媒介专家靳智伟看来,虽然在现代诗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但是自古当中国人遇到天大的困难或灾难时,甚至当我们一无所有时,我们还有诗。

“文化的‘痛点’常常

可以转化为传播的‘热点’与多媒体‘槽点’,靳智伟认为,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紧紧抓住了中国受众的诗词文化情结,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之美给予了精准的电视阐释。“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的热播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民族文化基础,通过电视传播手段,让电视受众以‘会诗’的形式与选手对话,与前人对话,与历史对话,与生活对话,并在这一过程中锤炼自己的审美情操”,在靳智伟的眼中,中国古典诗词的多元文化信息,与电视手段的有机结合,也使得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形成了诗样传播调性与多元文化传播形态。“这使得节目充满了诗情画意,在强化哲理的同时没有酸腐的道学气味。”

(据《北京晨报》)

# 正月十五不止是吃元宵

农历正月十五“元宵节”,又称“上元节”。在古代,这一天是向“天官”祈福的日子。因“天官”是人们公认的“福神”,故人们对“天官”格外崇拜。但对于“天官”的来源,却众说纷纭,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。

## 元宵节为纪念汉文帝扫除诸吕?

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。这一天,是春节后第一个重要传统节日——“元宵节”,又叫“上元节”“灯节”,现在的年轻人则称之为“中国情人节”。这一天的庆祝活动,过去主要有两大内容:一是赏花灯、猜灯谜、吃元宵;二是向“福神”祈福。这两种庆祝方式,已世代相沿1000多年,但现在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

不仅如此,对“元宵节”的由来,也一直都没有一种可信的说法,坊间流传的汉文帝为纪念扫除诸吕而定正月十五为“元宵节”之说,实属无稽之谈。此外,对“上元节”的由来、“福神”是何方神圣等问题,现在很多人也是不甚了了。因此很有必要“科普”一下,以正视听。

“元宵节”源于何时?一种说法是源于2000多年前的秦朝,但持此说者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。秦历以十月为岁首,即十月为正月,彼

时的正月十五是十月十五,史书无定此日为节日的记载,更谈不上什么“元宵节”了。另一种说法,也是当下最流行的说法是,在汉初时,汉惠帝刘盈死后,吕后篡夺了政权,后来周勃、陈平等人在正月十五日扫除了诸吕,拥刘恒为帝。汉文帝执政后,为纪念扫除诸吕这一天,每逢这天夜晚,都要出宫游玩,与民同乐。在古代,正月称“元月”,“夜”在古语中又叫“宵”,于是汉文帝把这一夜称为“元宵”,把这一天定为“元宵节”。这种说法貌似有板有眼,实则错漏百出。

史书记载,周勃、陈平等人在扫除诸吕,是在高后(吕后)八年九月,而非正月十五。汉文帝执政后,仍袭秦正朔服色,以十月为正月。他即位的时间是十月初七,他登基后在次年(在当时是同年)一月定下的大事,是立长子刘启为太子。当时肯定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,但不可能称一月为正月,更不可能称立太子的日子为“元宵节”。

## 古人深信“天官”能考定祸福

古代历法多变,夏历以寅月(即一月)为正月,殷历以十二月为正月,周历以十一月为正月。至汉武帝推行



“太初历”时,才恢复夏历,以一月为正月,因此把一月十五日(即正月十五)定为“元宵节”肯定是汉武帝改历法以后的事情。因司马迁曾参与改历法,有人认为司马迁在创建“太初历”时,就建议将“元宵节”定为重大节日。但“太初历”原著已失传,此说也无从可考。故“元宵节”始于何时,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。

“上元节”的称谓则源于道教的“三元说”。道教把一年中的正月十五称为“上元节”,七月十五为“中元节”,十月十五为“下元节”,合称“三元”。道教为何定正月十五为“上元节”?这个问题与“福神”直接相关。

“福神”是民间的称呼,道教则称之为“天官”。东汉时的早期道教,已奉天、地、水“三官”为主宰人间祸福

的大神,后来又将“三官”与“三元日”(正月十五、七月十五、十月十五)联系起来,所以后世又称“三官”为“三元”。“官者,司也,官天下而无私也”,“三官”中的“天官”,又称“上元”,据说生于正月十五,其职责是“总主上宫诸天帝王,上圣高真,森罗万象星

君”,每至正月十五,便下降人间,考定祸福,故人们称正月十五为“上元节”。

古人颇信“天官”能考定祸福之说,常向“天官”祈求免罪降福。1982年,一位农民在上中岳嵩山采药时,在山顶峻极峰的石缝中发现了武则天除罪金简,上刻“投金简一通,乞三官九府,除武曌罪名”等文字,“武曌”即武则天。古人求“天官”除罪,多将投放物放在高处,故此金简虽书“三官九府”,实则向“天官”祈福。这种将除罪简藏于峰顶的做法,也是从东汉早期道教沿袭下来的。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注引《典略》称:“请祈之法,书病人姓名,说服罪之意。作三通,其一上之天,著山上,其一埋之地,其一沉之水,谓之三官手书。”

又因“天官”被道教奉

为“赐福紫微帝君”,故民间遂以“天官”为“福神”,并于每年“上元节”向“天官”祈福,请“天官”下降赐福。通常的做法是在这一天贴对联,上联书“吉庆有余”,下联书“天官赐福”或“受天百禄”。后来又出现了以“天官赐福”为主题的吉祥图案,深受大众青睐。

## “天官”形象一派雍容华贵

道教所奉大神,多有原型。这个被中国人公认为“福神”的“天官”,到底是何方神圣?由于这种信仰年代久远,人们对“天官”的来历也说不清楚,即使是道教内部,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。《蠡海集》的作者认为“天官”起源于天上的“金气”,主生。《道藏》称“天官”是周幽王的谏臣,名为“唐宏”。《历代神仙通鉴》则说“三官”乃元始天尊从口中吐出,后来降生人间,变成尧、舜、禹三帝,其中“天官”就是帝尧。而在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,则称“三官”是陈子涛(一作“陈子椿”)与龙王三女所生。显然这种说法更符合人们将神人格化的愿望。

早期的“天官”图像,多与“地官”“水官”一起。据宋《宣和画谱》记载,有名画家周昉的《三官像图》,可见一

斑。“天官”被公认为“福神”后,人气急升,遂出现了“天官赐福”图,这种图画在宋代已有,但名称不叫“天官赐福”图。如《宣和画谱》就记载,陆冕有“天曹赐福真君”像,画中的“天曹”,应该就是指“天官”。到元明清时期,才正式定名为“天官赐福”图。因这幅吉祥图案人人喜欢,许多名家都经常以此为题材,创作出别出心裁的作品,如清代的黄慎、任伯年等都是画“天官赐福”的高手。同时,“天官赐福”图还广泛出现在陶瓷、玉雕、砖雕、木雕、刺绣、剪纸等上面,是家家必备的吉祥物。

“天官”的形象多为朝廷大官装束,身披五色袍服,腰系绣玉带,手执大如意,足蹬朝靴,面方口阔,五络长髯,喜容悦色,一派雍容华贵气象。有的“天官赐福”图则画“天官”立于悬崖之上,手持一轴浩命,上书“天官赐福”或“受天百禄”4字,或再加上蝙蝠和小孩,增强吉祥寓意。此外还有一种“天官”图,画面上“天官”笑容满面,手抱5个可爱的儿童,儿童手中分别捧着仙桃、石榴、佛手、鲤鱼等吉祥物,寓意“天官”给人们添福、添寿、添子孙、添财富等。而一幅画着“天官”手指太阳的吉祥画,则寓意“指日高升”。文/钟葵